

烏托邦

托馬斯·莫爾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1.6

2

2

烏 托 邦

托馬斯·莫尔著

戴 鎰 齡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联 書 店

本書 1516 年盧文城初版，原名为 De optimo Re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 中譯本的正文依据 1912 年紐約麥美倫公司翻印的魯濱孫的英譯本 (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 tr. Robynson, ed. W. D. Armes) 轉譯，并以苏联科学院 1953 年出版的俄譯本 (Томас Мор, Утоп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为主要参考。标题、分段以及重要字句的解釋訂正，有不少是依照俄譯本的。“‘烏托邦’的歷史意义”一文及附錄各种，都是从俄譯本里譯出的。

烏 托 邦

〔英〕托馬斯·莫爾著

戴 鎔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56 號

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3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5\frac{5}{8}$ · 插頁 3 · 字數 129,000

1956 年 8 月第 1 版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7,600 定價 (7) 0.65 元

統一書號 2002·64



托馬斯·莫尔
(荷尔拜恩作的画像)

目 次

“烏托邦”的歷史意义	沃尔金 1
------------------	-------

烏 托 邦

托馬斯·莫尔向彼得·查尔斯問好的信	20
-------------------------	----

“烏托邦”第一部——杰出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國家的大同盛世的談話，这是对英國名城倫敦的公民有声望的托馬斯·莫尔子爵談的.....	25
--	----

“烏托邦”第二部——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國家的大同盛世的談話，这是对倫敦的公民托馬斯·莫尔子爵談的.....	59
---	----

关于城市，特别是关于亞馬烏罗提城	62
------------------------	----

关于行政長官	65
--------------	----

关于职业	66
------------	----

关于交际生活	70
--------------	----

关于烏托邦人的旅行	75
-----------------	----

关于奴隸	95
------------	----

关于战争	103
------------	-----

关于烏托邦人的宗教	111
-----------------	-----

附錄一

莫尔和伊拉斯莫斯的書信摘錄	129
---------------------	-----

附錄二

莫尔小傳	彼得罗夫斯基	143
“烏托邦”的版本和翻譯	馬列因	150
注釋	馬列因和彼得罗夫斯基	157
參考書目		175

“烏托邦”的歷史意义

沃尔金院士

人道主义者和倫敦商界的寵兒，英吉利國王的大法官和那部鼓吹建立在財產公有原則上的社会制度的卓越對話的作者托馬斯·莫尔，是复雜的十六世紀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在形成特殊的絕無僅有的統一之后，仿佛都集中在他身上。那是資本主义發生的时代，資本主义通过封建关系狂暴地發展起來，而且其本身已經帶有着它所特具的新的社会对抗的开端。

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的小册子，以簡称“烏托邦”而异常著名，像它这样影响長久的作品，在政治和社会文献中是少見的。这个名詞对于一定的文学形式(烏托邦的小說)已成为通用的了，这不是偶然的。所謂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思想的整个方向，是和他以及他的基本論点分不开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可能，莫尔本人在总结自己的生活經歷时，認為“烏托邦”的意义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职位，比不上他为抵抗宗教改革所作的斗争。我們在莫尔被慘痛处死四百年后(他是一五三五年被处死的)重讀“烏托邦”，比他的同时代的人还感到更大的兴趣。而我們之所以对他的活动的其他方面發生兴趣，首先因为他是这部卓越的對話的作者。

“烏托邦”是最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的許多原理加以明白闡述的一本書。这正是這本書不曾减少的吸引力的根源。我們可以假定地說到古代世界的社会主义的要素，由这些要素可体会到消費共產主义，人类社会初期福利共有的观念，公共生產組織的含糊的思想等。可是，这一切都是暗示和零星的意見，沒有連貫成整个的系統。当我们探討“烏托邦”的可能有的文献張本时，我們應該考慮到这些意見的存在。人道主义者莫尔很熟悉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过这些意見的柏拉圖和其他希臘作者。在“烏托邦”里，莫尔提到早期基督公社的神話式的“共產主义”。無疑的，莫尔利用了这些主题，建成一个新的、全面周密考慮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古代奴隸制文化所無能为力的。作为那些意見的成熟的体系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有在新的时代，在資本主义关系的發展所創造出的基礎上，才会發生。首先闡明这体系的功績当然屬於莫尔。

“烏托邦”的文学形式（关于在一个無人知曉的國家游覽的故事）和古希臘后期的游記体小說是近似的。这种形式直到十九世紀还保持着它的活力（如卡貝的“伊加利亚旅行記”）。但是，这种形式，在歷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不比在莫尔的时代更能迎合大家的口味。“烏托邦”是在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地理發見已經开始而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寫成的。勿庸怀疑，比“烏托邦”稍早出版的書，如一五〇七年的“宇宙志引論”（“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及一五一一年的“新世界”（“De orbi nova”），是莫尔所知道的。以叙述新發見的國家为內容的書籍，不但在“烏托邦”的形式上能給予莫尔以暗示，在这些書里，他还可以找到用以發揮“烏托邦”的基本論題的材料：关于美洲及西印度土人的生活的故事，这些土人“不知道你的和我的之間的分別”，他們共同使用作为公共財產的土地，

鄙視黃金及珠寶……。 “烏托邦”和這種文獻的關係似乎可以用這樣一件事實來說明，即莫爾把亞美利哥·韋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為他的對話的中心人物。

對十六世紀初期條件下莫爾的社會政治思想所能達到的水平說來，“烏托邦”形式是再適合沒有了。“共產黨宣言”說到十九世紀初的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這種玄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產階級還處於很不發展狀態，……是從無產階級希望社會普遍改造的那種模糊趨向初次激發中產生出來的。”^① 對於莫爾的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產生玄想的未來社會方案的條件所作的這個指示，其具有效力當然不亞於對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時代。被莫爾看出而且引起他嚴厲指責的社會矛盾，只有一種萌芽着的力量才能加以消滅。莫爾雖有天才，却未能在他的周圍的社會里覺察出這種萌芽着的力量。社會的發展還不會創造出把無產者形成一個階級的那種必要的先決條件。科學社會主義尚不會到成熟的時候。“玄想的方案”在莫爾時代的條件下，是用以表達他的勇敢的社會思想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烏托邦”第一部的基本內容，是關於莫爾那個時代在歐洲各國中盛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談話。

在表示出作者觀點的游歷家希斯拉德的談話當中，當時在英國達到極點的絕對君主制度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希斯拉德抨擊君主制度的對外侵略政策，這種政策不但使被迫作戰的國家受到蹂躪，而且使本國的生靈塗炭。他指出，君主為了貪財圖利，對臣民進行無情的剝削，悍然不顧那昭示執政者必須照顧臣下幸福、保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七二頁。

臣下利益的这一合理統治的原則。希斯拉德斷言，人民选举执政者乃是为了人民自己，不是为了执政者本身。君主的光荣和安全在于人民的幸福。可是，这些正当的道理在國王的宫廷上是被置若罔聞的。國王的謀臣們阿諛奉承，經常为那些專以剝削老百姓为目的的決議案去尋找辯护的某些論据，將各色各样加强剝削的方法甘心向國王暗示……为此种种，他們臆造出了这样一种“理論”，即認為國王不会做不法的事，因为國家的一切，乃至國民，都是屬於國王的；老百姓所有的財產，只限于出于“國王的恩賜”而不向他們索取的那部分。他們还就这种理論大發謬論，說國民貧窮似乎会养成他們的忍耐的習慣，而且能保障社会安寧。相反地，貧窮倒往往是產生不安寧的根源；那些不滿意現存的生活制度的人尤其憧憬于革命。一个國王，既然在統治中剝夺了國民的生活福利，就應該承認自己执政無能。但是，國王們所更加关心的，是怎样用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手段去獲得新的王國，而不是怎样去好好治理已獲得的王國。为了战争，每个國家都拥有大批游手好閑的人，这种人是不宜于和平的劳动、也輕視从事劳动的人。希斯拉德在回答和他對話的英國人時說道：“为了預防战事于万一（其实你不要战事，战事是决不会發生的），养活难以数計的这批人，在我看來是对國家絲毫沒有好处的。这样的人危害着和平。不管怎样，和平是比战争更应该多多被我們关心的东西。”莫尔也借希斯拉德的話，相当坚决而率直地揭露了各國社会关系中异常令人驚心悚目的潰瘍。莫尔指出“数目龐大的貴族”是首要的禍根，最足以說明当时的社会的特征。貴族就像公蜂，終日無所事事，強迫自己地產上的佃夫为他們劳动。貴族为了增加收入，“敲骨吸髓”似地剝削朴实的老百姓，老百姓須辛苦操作去养活貴族和貴族

的大批奴僕。莫尔在这样指出当十六世紀初期未被英國根絕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后，接着特別強調那些可恨的新的标志，这些标志把已經开始了的資本的原始積累过程帶進封建关系的一般特征中。“烏托邦”第一部包含有几乎在一切論十六世紀英國的書中都引証过的那种特征，即在养羊業發达的影响下，英國農民的土地遭到剝奪——这是資本主义关系發展中重要的因素之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論及原始積累的过程，兩次引用了“烏托邦”^①。

希斯拉德說：“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一点点就滿足，現在据說變成很貪婪很凶蠻，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城市要蹂躪完啦。”这种飾着戲謔外衣的譴責，对于就農民喪失土地的原因及后果所作的深刻尖銳而且充滿着熾熱怒火的分析，是一个序曲。莫尔和希斯拉德認為，羊毛需要以及羊毛价格的上升是这种过程的开始关头。这个上升使大量土地占有者能可通过从農業轉到养羊業的方法來擴大他們通常來自地產上的收入。拥有出產上品羊毛的地區的僧俗業主們很快就考慮到他們能可这样作，并且开始把自己全部土地划出做牧場，把从事耕作的佃農驅逐出去，讓有人烟的住区变成了曠野。他們用詭計或暴力，迫使凡稍有產業的農民賤价出賣自己的產業，离开自己慣住的地方；养羊業決不如耕種業需要那麼多的人手。这些可憐的人們，不知何处安身是好，在漂泊中很快就將把變產所得的一切花得干干淨淨，任何人都需要他們工作，他們因此勢必以討飯为生，或是淪為盜竊。農民破產了，而同时那些一向从事羊毛加工和織布的窮人也破產了。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九〇九頁、九三〇頁。

和羊毛有关的全部事务落到少数富人手里。这些富人任意操縱市場，除自己本身的利益外，誰的利益也不考慮。因此，由于少数人的貪得無饜，会使对國家有利的东西变成对國家有害的。

希斯拉德說，政府理应制止富人的專橫，迫使他們把農庄田園恢复起來，讓窮人可能恢复農業和羊毛加工工作。可是，政府不是采取任何行动來消滅禍害的根源，却用尽法律的壓力來打击那些無从作正当的劳动而不得不流浪盜窃的窮人。希斯拉德一面指出政府所应遵循的道路，但同时并不相信任何明智的忠告会使政府依照这条路行。他在另一处提到，國家“似乎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狽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國家，实則为私人利益打算”。明智的忠告不能克服國王的政治見解。这些見解在國王左右的人們中占有优势，并且和他們自己的口味和願望是適合的。國王和他的謀臣固守着根深蒂固的傳統，对于一切新事物总是表示抗拒。他們从小就感染上錯誤的見解，不可能对于哲学家講的道理正当地予以估价。当他的對話者建議他去事奉一个國王，他的回答是：“假使我在任何國王的宮廷上，对于富國利民的措施作出条陈，尽力从國王身上根絕那些禍害因素，那么，我不是馬上就遭到放逐，不是成为笑柄么？”由此可見，希斯拉德虽然否認从上面的改良是可能的，可是却没有提出革命的改革來和改良对抗。然而必須指出，他議論中有一个地方，仿佛在順便当中，把“受压迫者的起义的精神”說成是“高尚的”精神。

莫尔并不僅僅分析社会制度的个别缺点以及探尋出同这些制度進行斗争的特殊方法。他从分析个别的禍害提高到他認為是社会上一切禍根的总原因。这个总原因即是私有制的統治。本書的第一部議論到私有制的最后几頁，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邏輯上也

是全部“烏托邦”的中心点。在这几頁里，作者作出了从上面对英國社会制度的批評所得的总的結論，也对下面要描寫的理想社会制度提供了理由。

希斯拉德断言，在私有制度下，既不可能談到正义，也不可能談到社会安寧。在私有制度下，每个人尽可能把一切攬为己有。不管社会上財富多么充足，这种財富是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們的命运就只有貧困。前一种人通常是凶狠邪惡的；后一种人是朴直真誠的，經常从事不是有利于自己个人而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劳动。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須徹底廢除私有制。莫尔認為，一切局部性的改革，都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治好社会的疾病。

正和欧洲各國的制度相反，烏托邦的制度是沒有私有制的制度。这样的对照，就其本身來說，在社会政治文献中并非新的。如同我們已經提到过的，这种对照是許多古代思想家所固有的。可是，莫尔在“烏托邦”中抱定的任务，是具体地指出怎样便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不要私有制度，而把公共生產組織起來。这个任务被莫尔完全独創地提出而且予以解决。就这点說，他沒有师承，沒有先驅。

烏托邦社会代表某种經濟統一性。作为國家最高机关的元老院，估量各个区域的全部產品，并且得于必要时重新分配產品。烏托邦的全部土地都是公有財產。國家可將劳动力从甲地調配到乙地。对外貿易也由國家經營。可是，生產的直接組織者不是整个國家，而是城鎮。对于莫尔，國家仿佛是城鎮的联盟。

在烏托邦，家庭是基本經濟核心。每个家庭从事于一定的手工業。家庭作業是在國家官員的監督之下；凡家庭自己所生產的產品都交与國家。这样，家庭实际上乃是公共的作坊。对这点还

應該補充一下，即這種家庭未必是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自然家庭。也許甚至可以認為，不是血統關係，而是經濟統一性，才是家庭的基本標志。不願操家中的手藝的兒童，可按照自己選擇的職業過到別的家庭中去。因而，親屬可存在於各種不同的家庭中；每個家庭只從事一種手工業。當一個家庭的規模超過經濟上的需要時，國家就把它的人員調配到另一家庭中去。

不難理解，這種家庭手工業的生產組織在烏托邦是如何發生的。在商業資本影響下到莫爾時代已經大大地蛻化的中世紀手工業，無疑地是這種生產組織的真正原形。我們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莫爾是把這種手工業制度的後來的一段發展去掉，把它恢復原來的狀態。但是，對於莫爾，資本的腐朽影響不是單純地被消滅掉，而是由國家領導的有益的影響來代替。不言而喻，這時結果就不是正確的根據歷史的恢復，而是按照作者一般意向加以理想化的恢復。但我們畢竟還是通過這些理想化的特點才可以看懂原書。

家庭手工業體系普及整個烏托邦社會，只有極小的例外情形。公民和家庭有聯繫，也和手工業有聯繫。每個公民學一種手工業。手工業幾乎是他一生勞動過程的基本職業。在烏托邦，農業不是一種手藝，這點足以說明莫爾的特色。這是烏托邦制度的一種最有趣味的獨特之處。在烏托邦，耕作被認為有重大的意義。可是，農業勞動是按照勞動義務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每個人必須從事兩年的農業勞動。只有特別愛好鄉村生活的人，有時可以請求把這個兩年的期限加以延長。因此，就鄉村的真正意義來說，對於烏托邦是生疏的。鄉村里只有農場，人們從城鎮到那里操作一個時期，期滿又回到城鎮重操自己的主要的手工業。一切公民的

基本住宅区和一切工作的組織中心是城鎮，城鎮附有公民可用以耕种的一定地区。这样，在新时代的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著作中，就已計劃了城市和鄉村对立的消滅，虽然在方法上是很原始的。

手工業和農業的一切產品構成了全社会的財產。每个公民从公共倉庫或公共市場領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在后來的各种烏托邦中，我們發見形形色色的在公民中分配產品的形式：有的規定算術上均等的定額，有的采用按劳取酬的原則，还有的是按照需要進行分配。莫尔在烏托邦里实行最后的一种形式，也是最徹底的一种形式。每个家長需要好多產品，就从社会上領取好多，在这方面他从不会遭到拒絕。莫尔已經明白，这样“按照需要”分配，是以產品充足为先决条件。有了充足的產品，就“用不着害怕任何人取得过多”。可是，他相信，这样的充足在烏托邦里是有保證獲得的。

我們关于社会过渡到更高的共產主义階段的观念是和生產力的增長相联系的。只有“在生產力跟着人們一切方面的發展也增強起來，并且在合作的財富源泉更丰富地湧流出來之后——然后能够完全超过那些狹隘的資產者的权利的眼界，这个社会在它的旗帜上寫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①生產力迅速增長的可能性的思想对莫尔來說是陌生的。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交，即是当莫尔活着的时候，技術進步在經濟生活中的意义表現得还很薄弱。我們在“烏托邦”一書里沒有發見提及烏托邦社会在技術基礎上有任何鮮明的优越之处。但是莫尔深信，在限定六小时工作日的情形下，可以保證全体公民得到充足的物資。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二頁。

莫尔証明，把烏托邦里的寄生現象完全取消，就可以在同样的技術方式下有充足的物資。莫尔在描寫社会寄生現象的特性及其意义时，是傅立叶的直接先驅者。在傅立叶的学說里，如大家知道的，寄生現象問題占有重要的地位。毫無疑問，傅立叶在这个問題上是依照十九世紀的情况，發展了“烏托邦”的基本原理。莫尔把豪門貴族、教士、侍僕、乞丐都看做寄生者。他把从事生產奢侈品的人們，以及劳动力使用得完全不合理或根本不使用劳动力的妇女，也都归于寄生者一类。

在烏托邦，只有从事于社会所不可少的活动的人們，而且只有当他們实际担任着被認為对公众有益的职責，才可以免除体力劳动。譬如，國家的官員免除体力劳动；被認為有才能而適宜于做科学工作的青年也免除体力劳动。假如，經過一定的时期，这样的青年辜負了寄托在他們身上的希望，他們就得轉向体力劳动。反之，假如在履行着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任何人表现出能从事智力活动，他就無須再从体力劳动，而被調到智力工作者当中去。

由于技術進步的觀念極端缺乏，所謂“不愉快的”劳动這問題就难以解决了。几乎对于一切烏托邦主义者，直到十九世紀，這問題都是一塊絆脚石。要解决這問題，有兩条可能的途徑。一条途徑是，獲得一批恰是对于担任这类工作感到特殊兴奋的公民。例如，就傅立叶說，他是把具有这种兴奋傾向的儿童組織起來去做成年人所厭惡的工作。另一条途徑是，組織任何一种强迫劳动的形式。這兩种办法都被莫尔用來解決問題。在烏托邦里有一种人，他們出于宗教的动机担任起不愉快的劳作，作为对于社会的特殊形式的服务。但这是不够的。于是在烏托邦里出現了一种特殊社会类型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仿佛是和莫尔的社会主义理論的总

的立場背道而馳的。可是，根据莫尔的观点，这种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比起他的周圍社会情况來还意味着前進了一步。这一种人即是所謂奴隸(Servi)。烏托邦的“奴隸”实际上是被判处終身强迫劳动的人。奴隸的起源是双重的——俘虜或法庭判決的人。必須指出，根据莫尔的說法，凡在烏托邦受这种懲罰的人都是在別國会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而且，烏托邦人自己对本國的自由公民从不宣告死刑，他們是把在本國被判处死刑的人贖買過來。这就不难明白，何以莫尔認為烏托邦的“奴隸制度”是一个良好的事实；这种制度和莫尔时代英國法庭判決的殘酷正是一个对照。

莫尔的大多数前輩把公有首先了解为消費品的公有。在莫尔的观念中，如我們看到的，生產的公有是注意的中心。当然，莫尔不反对消費的公共組織。相反地，他顯然很願意采取这样的組織。可是，在这个問題上，他表现出高度的縱容态度和高度的现实主义。顯而易見，他懂得在社会关系中主要的东西决定于生產組織，而不决定于消費組織。因此，我們在烏托邦國看到公共食堂，供絕大多數的公民享受。可是，願意独立开伙食的家庭，从公共市場領到食品。个人單獨开伙并不顯得危險，因此莫尔并不禁止。对于住所及地段上所表現的个人主义态度是很能搖动社会基礎的。实际上，这是足以滋長危害公有性的習慣。因此，莫尔規定在烏托邦里每十年必須抽籤重新分配房屋及園地。

这样，莫尔对于这些具体問題的解决乃是服从最高的社会利益，即服从保持烏托邦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則。

烏托邦政治制度的描寫具有很大的歷史趣味。烏托邦的全体官員概由公民选举。就中較低級的（攝护格朗特）由每戶戶主选